

※日本考證學研究專輯※

江戸後期の考證學 ——松崎謙堂的學問

吉田篤志著 連清吉*譯

序

所謂「考證學」，是在指稱清朝的學問、學風。被稱為考證學者的學者則稱自己的學問為考據學或漢學，並未使用考證學的稱呼。所謂「漢學」，是相對於宋、明朱子學、陽明學等哲理性學問，漢代所盛行的以經典為研究對象之訓詁學。清儒自認為繼承復興漢學的研究方法，故稱之也^①。又為了區別於漢代的學問，也稱為「清學」。

唯一說「訓詁學」，往往被誤解為執著於經典字句釋義之狹隘的學問。其實清朝的考證學亦以文獻考證而從事文字、音韻、訓詁的研究，進而以之考校訓解經典，即實事求是^②而有實證性、科學性之學問。換句話說，清朝考證學之以精密的歸納方法和強烈的批評精神而進行新的研究是不爭的事實。只是考證學是以文獻研究方法為問題的學問，思想性的論述較為薄弱，因此，就現代科學的觀點而言，考證學之有界限是不容否認的。

清朝盛行之考證學的成果，以長崎為門戶，陸續舶載傳入日本。到了享保

* 連清吉，長崎大學環境科學部文化環境講座副教授。

① 江藩(1761-1830)《國朝漢學師承記》略述清朝考證學家之傳記與著述。附錄〈國朝宋學淵源記〉載錄清朝朱子學者，可知清朝學者針對宋學而稱考證學為漢學。

② 「實事求是」者，根據事實以認識事物之本質，乃清朝考證學的學問特徵。語出《漢書·河間獻王傳》。就清朝考證學而言，見於經書為「實事」，其餘則非權威。經書是否曾為後人改竄者，乃其研究批評的對象，想像或推理都抱持極為審慎的態度。

(1716-1736) 以後，就有不少書籍傳入^③。當時的學者於著述中採行清朝考證學者論說的頗多，尤以大田錦城 (1765-1825) 爲最^④。在此以前，有一部分學者之間，就有此一傾向。如承繼徂徠復古學之徂徠門下太宰春臺 (1680-1747)、山井崑崙 (1670-1718)、根本武夷 (1699-1764) 等^⑤。又嫡出於徂徠學派的片山兼山 (1730-1782)、井上金峨 (1732-1784) 等，亦有此傾向。金峨門人吉田篁墩 (1745-1798) 崇尚考證、校勘、書誌之學，開闢清朝考證學的學風，大田錦城即繼承其學風。

清朝考證學流傳於江戶後期的儒學之間，風靡於當時的儒學界。雖然如此，江戶後期的考證學究否如實地因襲清朝的考證學？又同爲考證學派的學者，彼此的學問宗尚是否有異？茲以此問題爲前提，通過松崎謙堂 (1771-1844) 學問的探究，考察江戶後期考證學研究之一斑。

一、江戶後期考證學興隆的原因

在考察江戶後期考證學興盛的原因之前，先敘述清朝考證學興隆的原因。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指出：

予言清學之出發點，在對於宋明理學一大反動。夫宋明理學何爲而招反動耶？學派上之「主智」與「主意」，「唯物」與「唯心」，「實驗」與「冥證」，每迭爲循環。大抵甲派至全盛時必有流弊，有流弊斯有反動，而乙派與之代興。乙派之由盛而弊，而反動亦然。^⑥

另外的原因，則是清朝的政治趨勢所使然的。清朝是滿族征服明朝而建立的王朝，

③ 參考大庭脩：《江戶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大阪：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1967年）。

④ 大田錦城《九經談》，取清朝考證學家之說，以論述《四書》、《孝經》、《書》、《詩》、《左傳》、《易》，爲日本論說考證學之代表作。

⑤ 太宰春臺《古文孝經孔安國傳校正音注》、《論語古訓》等書，其考證之精密凌駕徂徠之上。山井崑崙、根本武夷合著之《七經孟子考文》乃以足利學校之古本校勘《易》、《書》、《詩》、《左傳》、《禮記》、《論語》、《孝經》之七經與《孟子》。幕府上梓而贈與清朝，清朝亦立即覆刻。阮元 (1764-1849) 所撰《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亦採足利本。又根本武夷亦校勘《論語皇侃義疏》。

⑥ 梁啓超：〈清學之出發點〉，《清代學術概論》（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21年）。

經世的實學畢竟是為政者所忌諱的，故學者不得不以樸學保身。政治壓力在明暗處都發生作用。如雍正帝在位（1723-1735）時的文字獄，多數的學者蒙受迫害，此即言論統制的實際施行，至乾隆年間，無數的書籍被列為禁燬書目^⑦，也是政治上的因素所導致的結果。在此政治狀況下，學者不得不皓首於樸學，即考證學的研究。但是清朝考證學之根底所在的理性主義，到底不能只用反動來說明其興起的原因，明末傳入的西洋科技的刺激，亦為原因之一^⑧。諸般因素的配合，乃造成清朝考證學興隆的局勢。

江戶後期考證學風興起的原因為何？如梁啟超所言，是對鼎盛學派的反動，即對徂徠復古學之反動，乃是其興起的原因之一。至於徂徠學派的弊害為何？敘述江戶時代儒學變遷之廣瀨淡窗（1782-1856）《儒林評》開宗明義說：

二百年來之儒風大略有三變。國初惺窩、羅山諸公初出佛歸儒而中興儒術。本邦儒道中興而又為程、朱學之開祖。次之，藤樹、闇齋、了介、益軒、錦里諸賢競起，其人學雖有不同，大抵本性理、主躬行。其所志在專擯斥佛法而明聖人之道。是一變也。及伊仁齋唱復古說，物徂徠次之而起。其說在務辦宋儒之失古而再興古義。於是儒流之爭為盛，不遑排佛矣。其學精訓詁、主詩文而不務躬行。是再變也。其後伊、物之說盛而程、朱之學衰，儒者多流於浮華放蕩，無務躬行者。於是世人厭之，再歸宋學者多。然宋學之弊亦非不鑑，故於程、朱、伊、物之說互有取捨處，世稱之折衷學。當時高名儒者十之七八折衷學也。其行狀中之懲放蕩而少赴收斂，然其趨利者極甚。是三變也。凡二百年來儒風人氣大略如此，此後將如何變化難預知。

伊藤仁齋（1627-1705）的古義學，荻生徂徠的復古學盛行，而以躬行為宗旨之程、朱學衰微，特別是徂徠死後約半世紀，世間雖推崇古文辭學，然批評之聲浪亦隨之而至。強烈批評徂徠古文辭學的，有井上金峨之門人山本北山（1752-1812）。北山著述《作文志彙》、《作詩志彙》二書，排擊李、王的陋習^⑨。《作詩志彙》的附錄曰：

⑦ 乾隆四十七年（1782），英廉等進奏四庫館《禁燬書目四種》，可知禁燬書目之數量極夥。

⑧ 參考宮崎市定：〈四書考證學〉，《アジア史研究》（四）（東京：東洋史研究會，1964年）。

⑨ 徂徠標榜文必先秦、詩必盛唐。選唐韓愈、柳宗元，明李攀龍、王世貞之文，編纂《四家雋》。詩以《唐詩選》為典型，開啓新格律之詩風。李、王者，李攀龍、王世貞也。

世之學者，於徂徠先生之經義雖有稍排擊者，於文章謂為日本開闢以來之一人，無間然者。縱虛名者，于今數十年也。然余獨斥徂翁云不通文章。初聞者無不愕然，甚者以余妄謂大言。是不明文章故也。明文章者，宜知余言不妄也。

即非難徂徠的文章。在此之前，駁斥徂徠之學的有石川麟洲(1671-1759)的《辨道解弊》，五井蘭洲(1699-1762)的《非物篇》，蟹養齋(1705-1778)的《非徂徠學》、《辨復古》，中井竹山(1730-1804)的《非徵》，唐崎廣陵(1756-1800)的《物學辨證》等。以上諸人有淡窗所謂折衷學之學者，而高揭折衷之學的是井上金峨。金峨的學問不偏主一家，以折衷群說為旨趣，批評當時墨守學統而爭辨不已之流弊，撰述〈師辨〉、〈解惑難〉二文，又非難徂徠《論語徵》而作《辨徵錄》。與井上金峨同時代之片山兼山亦激烈地批評徂徠學，其於《山子垂統》前編上指出：

凡《論語徵》十冊，削其誤謬及牽強附會之說，僅二冊可取用，其餘皆不足說。……物氏之學如觀雜貨肆，涉及經學文章兵法百技之事，故雖喧囂龐雜，多歧亡羊而寡得其要，但多胡椒丸吞之論耳。

蓋以徂徠之學博而寡要。唯金峨、兼山皆自徂徠學派出而終形成反徂徠學派的一員，其研究方法頗得於徂徠學的啟發^⑩。

金峨、兼山的學問有考證學的傾向，至門下吉田篁墩、大田錦城而形成考證學派之事，既已敘述及之。實則考證學派亦同於折衷學派，反對徂徠學派的契機逐漸高昂，在不遷於復古學、古文辭學的時代趨勢下興隆的。此事並非意味著徂徠學劣於折衷學、考證學，就革新時代的思想性而言，徂徠學遠超越二者，則是歷史可以證明的事實。

二、松崎慊堂傳略

松崎慊堂於〈松崎家譜〉^⑪敘述其略歷：

^⑩ 參佐藤文四郎：〈折衷學概括〉，《近世日本の儒學》（東京：岩波書店，1939年）。

^⑪ 引用岡井慎吾〈熊本における慊堂先生(二)〉（《斯文》，第13編第5號）所載濱野知三郎收藏者。岡井氏以為此〈家譜〉乃慊堂自撰的。

初代 明復（俗名退藏，母米光源藏女）

一、明和八年九月廿七日於肥後國益城郡北木倉村出生，幼名炎次。

一、天明六年九月來江戸，入林門留家。

慊堂往江戸的天明六年（1786），時年十五。出江戸之前，慊堂在什麼環境成長的。據海野豫〈掛川故教授慊堂松崎先生墓表〉（《全集》，卷一）的敘述：

先生幼慧，喜讀書。十歲，以父意，薙髮爲僧。年十五，乃欲歸於儒，逃而奔江戸。

即十歲之時，奉父之命而入佛門。《肥後先哲遺蹟》所載橫田常陸〈松崎慊堂由緒書〉則以爲：

自十一歲時遣真宗寺小僧，名呼教應。

慊堂於十一歲依皈佛門^⑫。慊堂十、十一歲的安永九年（1780）、天明元年（1781），正值江戸老中田沼意次掌握實權，展開賄賂政史的時期。慊堂撰述〈靜思精舍記〉（《全集》，卷五），記載其在真宗寺時的情形。

余年十二三而始好讀書。讀之不能解，漠然如赤子之於東西。苦之不能通，闇然如瞽者之於五采。大人常謂余曰：汝才驚下。雖然，好之甚篤，不怠則有成。唯惜哉！窮鄉僻邑而無師友之助。余亦常恨焉。

可知慊堂嗜好讀書，所讀爲佛典，往往苦於不能理解。目睹慊堂的窘迫，住持激勵說，侷促於僻野孤寺，不能知遇於切磋琢磨的師友，實甚爲可惜。慊堂也常引以爲憾。此真宗寺即在飽託郡畫津村下無田區，屬真宗本願寺派的崇專寺^⑬。就慊堂而言，在鄉野寺廟苦讀難以理解的佛典，不如到江戸鑽研幼時習染的漢學。

天明五年（1785），慊堂十五歲，逃離崇專寺，同年九月到達江戸。舉目無親而流浪街巷，幸得伊豆三島的法賢和尚的接濟，同年十一月五日入門江戸淺草的稱念寺，頗得住持玄門和尚的眷顧。翌年還俗，學於安達文仲（1726-1792）的門下。文仲爲服部南郭弟子，唱古文辭，與湯淺常山（1708-1781）等人爲南郭門下五子之一人。此後四年間，於稱念寺潛心研精，寬政元年三月，入於大學頭林信敬（錦峰 1767-1793）門下，學於聖堂御用屋敷學寮（後稱爲昌平齋）。同五年九月，寄宿

^⑫ 《肥後先哲遺蹟》未見，故引述前揭岡井氏之文。又岡井之文載記橫田常陸寄光永圓右衛門〈覺書〉（備忘錄之類），記述著慊堂於十一歲的春天，被送進宗專寺，改名爲教應。

^⑬ 同^⑪所引岡井氏之文。

於第八代大學頭林述齋 (1768-1841) 門下^⑭。

天明六年 (1788)，十代將軍德川家治去世，十一代將軍家齊繼立，田沼意次失勢，白河藩主松平定信參與幕府政治，實施政治、經濟、文教諸制度的改革。於文教政策方面，重視幕府初期以來奉為官學的朱子學，期以匡正政治的道德與秩序。於是任命柴野栗山 (1736-1807)、尾藤二洲 (1745-1813)、岡田寒泉 (1740-1816) 為博士。其後以出身於地方的古賀精里 (1750-1817) 取代岡田寒泉。此三博士的起用，主要是以政治為目的。寬政二年 (1790) 以朱子學為正統，其他諸學問為異端，而發布「異學禁令」。寬政七年更頒行「異學者登用禁止令」。因此，學界的主流乃傾向於朱子學；然而民間則有精研思想性較少的古注學、校勘學、目錄學、文字學的儒者，或專注詩賦的詩人出現。

大學頭林信敬的後任，松平定信起用美濃岩村藩出身的林述齋，聖堂的私塾奉獻于幕府，以作為官立的大學，改稱為昌平坂學問所（略稱為昌平黌）。招聘三博士為大學教授，嚴禁朱子學以外的學問授受。此為元祿以後朱子學雖抑制陽明學、古學等學派，實則藉助政治體制而使然，並非學問研究有所超越。

在此政治情勢下，慊堂在昌平黌勤學精研。當然所修習的是朱子學。雖然如此，在入林門之前，曾隨安達文仲研讀古文辭學，故也具有此方面的素養。同學者有佐藤一齋 (1772-1859)。一齋在入學昌平黌之前，曾學於折衷派井上蘭臺 (1705-1761) 養子井上四明 (1730-1819) 的門下，出入徂徠學派鷹見星皋 (1750-1811) 之門而聽講古文辭學。又學於懷德堂中井竹山 (1730-1804)、古注學皆川淇園 (1734-1807)。故佐藤一齋之學是朱、陸調和，以官職的緣故而標榜朱子學，在私塾則以陽明學的講授為主。慊堂與一齋相切磋琢磨，自然亦體得陽明學的知識。

其實林述齋亦非純然的朱子學者。《續近世先哲叢談》卷上記載著：

述齋一旦自謂：我久攻漢、唐之學，訓詁瑣屑可厭，今將本宋說以成一家言。當時林述齋英氣勃勃，不肯屈下於人，獨有澀井太室者，稱林門高足，述齋一見心服，遂執贄師事之。

^⑭ 參岡井慎吾〈熊本における慊堂先生(三)〉(《斯文》，第13編第10號)所引松崎家藏慊堂致大城多十郎(時習館副教授壺梁煥)書。又鹽谷宕陰〈慊堂松崎先生行述〉亦引述及之。水田紀久〈慊堂報恩〉(《文藝論叢》，第16號，後收入《近世日本漢文史論考》，汲古書院，1987年)指出：林家門人錄的《升堂記》載錄慊堂於寬政二年入學林家，與慊堂書簡所述相差一年。

林述齋既師事折衷派學者澀井太室(1719-1788)，則述齋門下的慊堂亦受其影響不少。佐藤一齋小於林述齋四歲，二人亦師亦友，慊堂雖為述齋門人，僅小述齋三歲，故三人相互鑽研砥礪之情形，蓋可想見。

享和二年(1802)，慊堂受命為掛川藩儒，時年三十二。至辭去官位，約任職二十年。其後移居江戶城西(今澀谷)羽澤村，葺築石經山房以栖遲。弘化四年(1844)四月歿，享年七十四歲。慊堂的學問之傾向於考證學，是在移居石經山房以後，在此以前，由於身居藩儒的官職，所講授的大抵以朱子學為主。因此，即使傾注於考證學，亦不排斥朱子學。

三、影響松崎慊堂考證學的學者

慊堂潛心於考證學是於掛川藩致仕，移居石經山房，而與狩谷掖齋(1775-1835)、市野迷庵(1765-1826)、山梨稻川(1771-1826)交遊的結果。現存的《慊堂日曆》是文政六年(1823)四月十四日至弘化元年(1844)三月十九日，即慊堂五十三歲至七十四歲去世之年的日記¹⁵。其與掖齋等人交遊的記載頻繁出現，特別是與掖齋的交誼更深，影響深遠。鹽谷宕陰〈慊堂松崎先生行述〉(《全集》，卷一)曰：

吾志於復古，得之于掖齋者為多。

即慊堂自認受益於掖齋的所在甚多。慊堂以為掖齋的為人治學如何，其所作〈掖齋狩谷先生墓碣銘〉(《全集》，卷九)簡要而得其旨趣。茲摘錄於後：

翁少時志於律令學，謂不涉唐代諸籍，不能窮其根據。乃採《六典》、《唐律》、《太平御覽》、《通典》等諸書精研之。遂上溯漢代，又進而修《六經》，恍然有所發明。其終身崇奉漢學，蓋基於茲。翁曾與迷庵談經義。迷庵曰：何所主？翁曰：主漢、唐注疏。迷庵曰：非也，宜從事於宋儒經解，否則不適用於實用。翁退，執宋儒傳注，銳志鑽穴者，凡二十餘月。謂兩漢經學最重師法，授受相傳，確有淵源。六代迄唐，雖漸失龐雜，古法尚不至蕩然。至宋儒，倨然師心蔑古，究非洙泗之正派也。即往質諸迷庵。縱橫辯駁，徵據明晰。於是迷庵幡然心折，遂一掃宿習，亦從漢學。……翁富于藏書，而唐鈔宋

¹⁵ 靜嘉堂文庫所藏《慊堂日曆》，由第三冊至第二十四冊，缺第一、二冊。所謂文政六年者，第三冊之開頭。

槩元刻、晉唐之碑刻法帖，所極難得者亦多兼儲。每言吾非誇西洞之富，欲化誤本為善本耳。歷代古泉貨幾百品，自幼之時愛玩之。或遇清閑興適，攤列牕間，品評之。或謂錢幣乃無益之玩，孰知據是可徵度量、稽世代、觀風習，宛然有尚友千載之想。翁又藏漢鏡、漢錢、王莽之威斗、中平之雙魚洗、三耳壺，因號六漢老人。或曰：是五漢也，其一何在？翁笑曰：身嗜漢學，乃亦非漢時物哉！

掖齋幼時志於律令學，培養其成就考證學家的根基。又學於本邦考證學始祖吉田篁墩，確立其考證學之學風。慊堂〈墓碣銘〉所述：市野迷庵稱服掖齋的考證而自宋學轉向漢學，「六漢老人」的逸事，皆可以窺知掖齋崇尚漢學的所在¹⁶。狩谷掖齋最用心力於《說文》的研究，著有《轉注說》、《說文解字斟銓考注》、《說文檢字篇》等。又長於校勘考證之學，著述《本朝度量權衡考》、《日本靈異記考證》、《扶桑略記校譌》、《上宮聖德法王帝說》、《古京遺文》、《錢幣考遺》、《箋注倭名類聚抄》、《日本見在書目證注》。此皆以考證學而用力於本邦古籍整理的論著。

慊堂於山梨稻川的評價，見於所撰〈稻川先生山梨君墓銘〉（《全集》，卷十）。茲揭之於後：

（山梨稻川）既壯，聞木君宣長之徒論皇國古音，恍然有悟。於是鑽究《廣韻》，以溯漢、秦、三代。曰三代之音，正音也。秦都雍，雍音也。漢起豐沛，多楚音。以及三國六朝，大槩皆方音，非正音也。音韻正而古書可讀也。作〈古聲譜〉、〈考聲微〉、〈諧聲圖〉若干篇。又曰：《六經》、百家語，出於秦以前者，皆古文也。唐、宋以下，不目睹古文，故其說多妄。《說文》，說古文者也。古文，六書也。古小學惟學六書也。指事、象形、會意、象聲四者為經，所以紀名物、行言語，皆望而可知者也。轉注，注是四者也。假借，借是四者也。二者為緯，緯者錯綜是經者也。知經不知緯，九千文有不足者。知經知緯，縱橫關紐，九千文用之有餘。今之學者粗識唐、宋俗字耳。其果得讀《六經》、百家語哉！作《說文緯》三十卷。時歲五十六，抱二書而東下，將與江戶名儒碩學論而定之。居三月而病，病二月而殯殮，終不起。惜哉惜哉！

¹⁶ 狩谷掖齋的書齋名為「實事求是書室」（〈墓碣銘〉），淺草天龍寺的墓碑為「常關院實事求是居士」，可知掖齋頗推崇清儒考證的學風。

山梨稻川終生用力於音韻學。其著述除〈墓銘〉所記〈古聲譜〉、〈考聲微〉、〈諧聲圖〉（此或合爲一書，如〈墓銘〉所謂「二書」之一），《說文緯》外，另有《古今韻箋》、《古音律呂三類》、《古音譜》、《字緯》、《文緯略》等。尤以《說文緯》爲不朽之名著。稻川，駿河人。是地少漢籍，稻川又家貧，欲讀之書亦不能購得，然而《說文緯》之論述頗多創見，與清江聲、戴震、錢大昕、段玉裁等學者之說往往有暗合的所在^⑰。論著草成至江戸，欲與名儒碩學論定切磋，不久病發去世，甚爲遺憾。

墓誌所記是謙堂對掖齋、稻川的心證，亦可知謙堂對二人學問成就的評價甚高。稻川遠處駿河，二人雖不能頻繁交遊，謙堂於稻川音韻學的造詣卻極其敬服，至於掖齋的《說文》研究，對於謙堂的影響更深。謙堂雖無音韻、《說文》的著述，其著作中亦有文字聲韻的蘊藉。又掖齋有《本朝度量權衡考》，謙堂亦有《尺準考》的著述，考證中國度量衡的起源^⑱。再者《謙堂日曆》所記讀書筆記與品評，其知識之賅博，頗爲驚人。不僅是經學論述，亦涉及天文、曆數、醫藥的記述。攻治考證學所不可欠缺之博採的態度，由此可以窺知。總之，謙堂之考證學問是受到掖齋等考證學家的刺激而形成的。

四、松崎謙堂的漢籍翻刻

謙堂之所以稱爲考證學家的理由之一，是盡力於漢籍的翻刻事業。寬政以迄幕末，昌平黌或諸藩出版的官版或藩版顯著增加。寬政十一年（1799）至慶應三年（1867），幕府出版經部四十六種、史部三十一種、子部七十種、集部五十二種，計一百九十九部官版^⑲。原本是昌平黌使用而出版之朱子學濃厚的書籍，但是弘化四年（1847）出版之《官版書籍解題略》的〈凡例〉云：

以宋、元槧本及諸家精校善本官刻之。

^⑰ 江聲《六書說》，戴震《聲韻考》、《聲題表》，錢大昕《聲類》，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等皆爲有關《說文》的著作。此外，其他論述亦可考知皖派學者於《說文》學的蘊積。

^⑱ 中國度量衡的起源，歷來皆據《漢書·食貨志》而作「黍說」。謙堂辯駁之而作「人身說」。此說亦見於《說文》。

^⑲ 參樞山精一《官版書籍解題略》（1847）、內野皎亭編《官版書目》（1832）。

可知當時逐漸有以善本為底本而校訂出版和刻本的欲求。

藩版也伴隨著各藩藩校的增設而遽增。特別是天保十三年(1842)六月：

文學之儀當時頗為重視，官版特所冀求，至諸家藏版僅不過數十部耳。高位者
憂心之，乃令十萬石以上諸侯出大部書一、二部藏版，刊行傳諸後世。

對十萬石以上諸侯頒行大部書一、二部出版獎勵令，各藩出版事業乃呈現盛況^⑳。

對於出版獎勵令，慊堂欣然而曰：「是盛舉也。張大之者在吾儕。」（鹽谷宕隱〈行述〉）^㉑乃蒐輯僅存於我國而中國既已亡佚之善本古籍，並為之解題而成《擬刻書目》一卷，上呈當時之大學頭林禔宇(1793-1846)。禔宇為林述齋之子。在此之前，慊堂亦致書述齋，勸諫致力於宋槧稀觀漢籍的翻刻事業^㉒。由此書簡固可窺知慊堂於漢籍之造詣極深。茲摘錄書簡所記書目於後。

- 《周易正義》十四卷（應永年間鈔本）
- 《尚書正義》二十卷（北宋槧本，金澤文庫舊藏）
- 《禮記正義》七十卷（北宋槧本）

以上單疏本

- 宋建安刻本附釋音《毛詩注疏》二十卷（南宋本）
- 宋建安刻本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六十卷（宋槧本）
- 《春秋左氏正義》三十六卷（單疏本，金澤文庫本）
- 《史記》（慶元年間建安黃氏刻本）
- 《漢書》（慶元年間建安黃氏刻本）
- 《後漢書》
- 《文選六家注》（宋崇寧六年所刻蜀大字本，嘉靖時汝南袁聚摹刻）
- 《文選李善注》（宋紹熙中尤延之刊本，嘉慶年間鄱陽胡克家覆刻）
- 《杜氏通典》（楓山御本，宋板，開卷有大宋建中靖國云云之文）
- 《大唐開元禮》
- 《舊唐書》（京都東福寺龍眠庵藏，古鈔本）

^⑳ 參東條琴臺《諸藩藏版書目筆記》、笠井助治《近世藩校に於ける出版書の研究》（吉川：弘文館，1962年）、矢野玄亮《藩版一覽稿》。

^㉑ 《慊堂先生遺墨》（《日本儒林叢書》第三卷收載）亦謂「誠古今之大盛事」，而論述漢籍翻刻的必要性。

^㉒ 〈松崎慊堂板行書籍意見者〉（1842）。

○元版《資治通鑑》胡三省音注

○畢沅《宋元通鑑》

以上謙堂所揭之書目²³雖未翻刻，但謙堂執著於善本翻刻刊本的用心，卻可推察而知。其後，述齋之所以編輯廣受中國學者好評的《佚存叢書》，或許可以說是受到謙堂的影響。再者，某諸侯或受到謙堂熱心於名山事業的感動，而贊助謙堂刊行《縮刻唐開成石經》。所謂《縮刻唐開成石經》是以木版縮刻唐開成年間刊刻的石經。

石經是石刻經書正文，乃印刷術尚未發明之前的產物。漢平帝元始元年（西元元年），王莽（45B.C. — 22）命甄豐石刻《易》、《書》、《詩》、《左傳》，是石經之始。唐開成石經之前的代表石經是東漢靈帝熹平四年（175）三月，詔諸儒校正經文，命蔡邕（133-192）石刻，於光和六年（183）完成，而立於洛陽太學門外的石經。此即有名的熹平石經，前後共費九年的歲月。書體為隸書，所刻經書為《詩》、《書》、《易》、《春秋公羊》、《儀禮》、《論語》²⁴。唐代尚存十分之一，五代戰亂而悉數毀盡²⁵。熹平之後，魏齊王（廢帝）正始（240-248）中，又刻石經，名曰正始石經。立於洛陽漢碑之西，書體為古文、篆書、隸書三體文字，故又稱三字石經。所刻經書為《書》、《春秋左氏傳》。其後的石經，即是開成石經。此乃唐文宗太和七年（833），勅命唐玄度，於九年（835）開始刻石，於開成二年（837）十月完成，立於長安太學（國子監），故稱「開成石經」。所刻的經書為《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孝經》、《論語》、《爾雅》等十二經及張參的《五經文字》、唐玄度的《九經字樣》²⁶。雖經五代兵亂的損壞，大抵比較完全地殘存於後世，今則保持於西安的碑林。清朝考證學家阮元即據此而撰述《十三經注疏校勘記》。

²³ 安井小太郎所著之《謙堂の漢籍翻刻に關する意見》（《斯文》，第1編第1號）列舉此書目。據澀江抽齋、森枳園《經籍訪古志》（1856）而標識收藏的所在。

²⁴ 據羅振玉《漢熹平石經殘字集錄》（1903）。

²⁵ 宋洪适（1117-1184）《隸釋》謂熹平石經僅存二千零十一字。

²⁶ 主事石經校訂的是國子監祭酒鄭覃，臨摹者由書石門下艾居晦、陳玠等數人分擔，校勘審定則各經專擅之學者負責。清康熙三年（1664），陝西巡撫賈漢補刻《孟子》合為《十三經》〔詳參塚田康信：《西安碑林の研究》（東京：東方書店，1983年）〕。《五經文字》作於唐代宗大曆十一年（776），《九經字樣》成於唐文宗太和中（827-835）。

慊堂之所以致力於開成石經的縮刻，乃基於當時的儒者務於浮說碎義而疏忽經書本文，以致經學研究方法產生謬誤的緣故。海野豫〈掛川故教授慊堂松崎先生墓表〉（《全集》，卷一）所述慊堂的論述，即可窺知慊堂於經學研究的見地。

經訓簡易，炳若日星。箋注茅塞，大道乃荒。欲復諸古，但在諷經與識字耳。苟不然，望文生意，師心自斷。私意日長而經旨益乖，得無非班志所謂碎義巧說，破壞形體，終以自蔽者乎哉！我欲令學者專玩經文，存其大體，以經解經，不拘傳注。如是而日累月積，義理自然融會冰泮。奉正朔、批閏位，未疏臆說，如腐朽之受利刃，庶幾用日少而畜惠多。三十而五經立者，可以期也。若夫訓詁鑽究，則原諸《說文》，參諸漢注唐疏，餘力以逮《三史》、《文選》。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⑳

慊堂治學的方法，在於探究經書本文，以正確地理解經典的意義。即正確地把握經文字句的意義而指陳《說文解字》的重要性，並以爲又必要參斟漢、唐的訓詁。此重視《說文》與漢、唐注疏即是清朝考證學的宗尚所在。清乾隆、嘉慶年間，考證學達於鼎盛，故稱之爲乾嘉之學。代表的學者有惠棟(1697-1758)及其弟子江聲(1721-1799)、余蕭客(1729-1777)、錢大昕(1728-1804)，戴震(1723-1777)及其弟子段玉裁(1735-1815)、王念孫(1744-1823)、念孫之子引之(1766-1834)等。惠棟及其弟子稱爲吳派，戴震及其弟子稱爲皖派^㉑。特別是皖派之學重視語言、文字的研究，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聲名最著，王念孫《廣雅疏證》、王引之《經傳釋詞》皆清朝考證學的代表著作。清朝後期考證學的知名學者俞樾(1821-1906)即繼承王引之的學問，於校勘有成績的盧文弨(1717-1795)亦此時期的代表學者之一。慊堂重視《說文》而似於皖派學者的治學態度，學問方法自然著重於文字訓詁，進而精密地考證經傳。

《縮刻唐開成石經》之得以刊行，乃得力於慊堂對學問研究的執著與漢籍翻刻的熱忱。當初並無刊刻的資金，得各地藩主的贊助，即掛川太田侯出資付梓《三禮》；《孝經》、《論語》、《爾雅》則肥後細川侯；《易》、《書》、《詩》由

^⑳ 鹽谷宕陰〈慊堂松崎先生行述〉亦有類似的敘述。

^㉑ 吳派者，江蘇吳縣之惠周惕（生卒年不明）、惠士奇(1671-1741)、惠棟三代之學興隆，故稱之。皖派則由於戴震等人出身於安徽（皖）而稱之也。又惠氏三代之學亦稱爲「三惠之學」，戴氏師弟之學則謂之爲「戴段二王之學」。

西條松平侯；《三傳》、《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則佐倉堀田侯給付，始於天保十五年(1844)完成。唯謙堂大功未成而歿。縮刻之校勘由謙堂主其事，而門下弟子小島成齋(1796-1862)、鹽谷宕陰(1809-1867)、安井息軒(1799-1876)襄助之。石經臨摹賴小島成齋及其弟子而成之事，謙堂跋文詳述有之。又〈例言〉指出：

其殘闕剝落處，則據宋本最古且確者補入，施點于右旁以別之。

其校勘而重視宋本的學問旨趣，可以推察而知。又作《易》、《書》、《詩》、《三傳》校譌，亦可窺知謙堂的經說。另外，《宋本爾雅》的翻刻，則援引清儒之說以爲校勘糾謬²⁹。

結 語

以上通過松崎謙堂及其學問的論述而考察了當時考證學風之一斑。唯江戸後期著名的考證學者是吉田篁墩、大田錦城。篁墩的學風由所著《經籍通考》、《活版經籍考》、《足利學校書目附考》、《論語集解考異》、《真本墨子考》等考證學論著即可考知。又有《清朝創業事略》的著作。至於平生推崇清儒名著的旨趣，由所著《近聞偶筆》卷四：

清代諸儒著述如林，各各名家。就中卓爾傑作，吾得三書。考據賅備，援證探討，不遺餘力，盧文弨之《校汲冢周書》是也。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純漢、唐舊學，余蕭客之《古經解鈎沈》是也。涉遠履險，見聞詭異，議論精到，文章瞻新，椿園之《西域聞見錄》是也。

由此記述而可以知之。篁墩之青年期的寬延年間至壯年期的明和年間，大量的漢籍舶載傳入³⁰，篁墩博覽清儒著述是無可置疑的。

錦城之學風，由所著《周易比例考》、《毛詩六義考》、《論語名義考》、《三論異同考》、《荀子考》的書名，蓋可推知皆爲考證學之著作。《論語大疏》

²⁹ 未見。注²³所引安井小太郎之文指出：謙堂跋文謂原本爲京都某醫所藏，狩谷掖齋借鈔刻之。《經籍訪古志》則謂原本爲京都福井榕亭之崇蘭館本。

³⁰ 寬延四年（即寶曆元年，1751）刊行的山田三郎兵衛編《唐本類書考》的〈題言〉謂：「殊近年明、清之書航至崎港部數，真比計恒沙猶難。」

爲旁徵博引之著作，其博覽清儒之說以爲論述的情形亦可窺知。錦城於《九經談》卷一，說：

得明人之書百卷，不如清人之一卷也。

又於《梧窗漫筆後篇》卷下，推崇清儒的學識說：

近世清人有三才子，紀昀、趙翼、袁枚也。……紀昀校合《四庫全書》，爲大博識家。趙翼作《陔餘叢考》、《二十二史劄記》，爲史學家。袁枚爲詩文家。三人皆有卓出時輩之見解，故不爲經學也。讀《劄記》之書，則明趙翼存亡興廢之理，非拙劣經學家之可及，亦可謂史神之人也。

《九經談》撮取清儒諸說之所在，隨處可見，錦城著述以清儒之說而成者，蓋無庸置疑。

比較慊堂的考證學與篁墩、錦城的異同，則慊堂注重漢、唐注疏之學，並參考宋本等古籍以考究經傳字句之義；篁墩、錦城則旁徵博引清儒之說以爲自身的見解。故雖同爲考證之學而方法有所差異。近於以實事求是爲宗尚的清儒，特別是乾嘉學者之學問的，是慊堂的學問。又錦城於前引《梧窗漫筆後編》的文章之後，駁斥余蕭客《古經解鈎沈》、惠棟《九經古義》、王鳴盛《尚書後案》等書爲「無用之學」，可知其對「漢學」所抱持的態度有所不同。

慊堂的學問爲考證學，則自然缺乏思想性，雖然學問是考證學，其日常行誼卻未必了無思想性。衆所周知，天保十年（1839）五月，蠻社之獄而渡邊華山（1793-1841）遭禁錮，慊堂以六十九歲之老軀而置之度外，以致力於脫罪解救的運動。慊堂以實踐躬行爲職志的儒者胸懷，由此可見一斑。又慊堂、掖齋等人之考證學亦影響及於後世之國學與蘭學，爲幕末西洋科技較無抗拒地輸入本邦的原因之一。此方面的問題，尙待詳細研究。

精詳比較考察江戶後期與清朝考證學異同研究，非經年累月的探究不可，故擬特定對象以進行研究。又慊堂的《慊堂全集》、《慊堂日曆》的篇幅甚鉅，尙有研究的餘裕，待日後審慎論究。

——譯自《大倉山論集》第23輯（昭和63年3月），頁203-224。